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批评的剖析

ANATOMY OF CRITICISM

Northrop Frye 著

批评的剖析

ANATOMY OF CRITICISM

Northrop Frye 著 朱刚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的剖析 / (加) 弗莱 (Frye, N.) 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ISBN 978-7-5446-1457-3

I. 批… II. 弗…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07914号

图字: 09-2006-767号

©195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renewed PUP, 2000 paperback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is special edition is for sale in Chinese mainland only. Sales outside Chinese mainland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6 字数 485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457-3 / I · 0120

定 价: 5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陆建德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常耀信

郭继德

黄源深

蒋洪新

李公昭

李维屏

林骧华

刘海平

申 丹

盛 宁

石 坚

史志康

王守仁

杨仁敬

殷企平

虞建华

张 冲

张定铨

朱 刚

庄智象

出 版 说 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多数高校英语专业都开设了西方文论课程,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市场上,有关西方文论的图书往往都以译介类的为主,缺少原汁原味的引进图书。为了使读者能亲近西方文论的原版著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邀请国内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出书单,从国外出版社引进了一批西方文论方面的专著,以满足广大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需求。鉴于西方文论重理论、强调逻辑推理和阐述论证,原文理解难度较高的特点,出版社还邀请了专家为每本著作撰写了简洁精辟的导读,希望能在内容上拉近原著和读者的距离。

西方文论源远流长,精彩深邃;自20世纪以来,其发展更是异彩纷呈。丛书在策划和筛选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会所有专家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限于经验和专业水平,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还望各位专家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近 10 年,国内一些出版社经授权直接印行外版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著作,并以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标价,受到大学师生和研究者由衷的欢迎。在这些图书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剑桥文学指南丛书”尤其成功,它们大大推进了我国英语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20 世纪下半叶是众多文学理论各领风骚的 50 年,文学研究的面貌大大改观,理论家和批评家取得了与诗人、作家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正是各种文论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一直处于一种天真的状态,对主导批评活动的或明或暗的方法、预设和前提不加追问。上世纪 70、80 年代开始,欧美大学文学系对理论课程的需求迅速增长,一些文论选本和文论导读、入门也应运而生,有的还被译成了中文,在大学师生中很受欢迎。这些辅助性的指南固然有其用处,但是要了解文论的精髓,我们还是应该暂时把二手译作放在一边,回到原著。

在一些学者的大力推荐下,外教社决定再推出“西方文论丛书”,首批五种。这些著作堪称文学与哲学研究的经典,其影响不必由我在此赘述。首批文库中有已出中文译本,不过对于能阅读英语原版的读者而

言，翻译毕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能直接亲近原文，当然最好。现在各大学哲学系和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师生，英文水平也很高，相信他们也是文库的忠实读者。

我还想乘此机会强调，对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师生而言，阅读批评理论著作必须与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相结合。现在有一种戏说理论的空疏文风，一些概念、术语就象投资市场上急速膨胀的热股一样受到追捧，炒作者似乎有一种大权在握、独领风骚的美妙感觉。泡沫一旦破裂，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学生。奥尔巴赫和弗莱等批评大师从来没有把理论当成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或争夺话语霸权的场所，他们的理论发挥总是伴随着作品细读以及由此体现的智慧与敏感。记得前几年一度被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米勒教授（J. Hillis Miller）来华讲学时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本牛津蓝皮袖珍版特罗洛普小说轻轻摩挲，听众深为他对文学的挚爱而感动。我们不妨通过这些大师来认识理论与文学阅读相辅相成的各种可能性。

陆建德

加拿大处在欧美夹缝中，学术界能够引以为荣的世界级人文学者屈指可数，最有影响的是两位当代文化批评家，一位是曾提出“地球村”概念的麦克卢恩（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另一位是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弗莱是多伦多大学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出生于魁北克省南部，毕业于多伦多大学，1936年担任牧师，后到牛津大学读研究生，1939年毕业后回到多伦多大学任教，研究加拿大文学与文化。

《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巅峰之作。“神话”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一个文化/民族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从一个侧面讲述了该民族的历史，如犹太神话中关于创世、出埃及、人物传记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的形成史，也是犹太文化的产生史。所以民族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是她永远追寻的自我意义。对文学家来说，神话首先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世界名作大都从本民族神话里汲取素材；神话还可以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希腊语“*mythos*”就是叙事、情节的意思），这也是它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对结构主义诗学来说，神话也蕴含了叙事结构，是文学叙事的基本元素。神话原型批评则把神话作为仪式和梦幻的文字表达方式，使仪式获得意义，梦幻具备形式。神话一度被认为非理性、不真实，所以长期以来受轻视，地位一直不高。18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尤其是维柯的《新科学》发表之后，

神话思维被确认为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诗的智慧”的源泉，和理性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19世纪神话学进一步发展，甚至有人主张神话就是科学复归于诗，比抽象理性更适于培养人的认知能力。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 Frazer）在19世纪末揭示出不同文化的神话传说和宗教典仪里经常出现相似甚至相同的意象或主题。弗雷泽的代表作《金枝》洋洋洒洒十二卷（后出版经过精缩的一卷本），研究世界各文化中以巫术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仪式、民间神话和民间习俗，力图勾勒“人类意识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轨迹”。对神话原型批评来说，《金枝》的主要理论建树是提出“交感巫术原理”和“禁忌”观。在原始人看来，人与自然间存在某种交感互应关系，所以人们通过象征性活动（巫术仪式）把自己的愿望、感情赋予自然，以控制实际上自己无法把握的大自然。随着文明的演进，由人为中心的巫术渐被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所取代，并最终让位给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虽然巫术—宗教—科学之间差别巨大，但三者有一个共同之处：都相信自然具有秩序和规律，所以弗雷泽相信利用科学可以更好地解释远古的神秘仪式、奇异风俗和怪诞神话。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作家创作和白日梦》中曾说过，神话是一个民族“幻想”的残留物，只是形式上经过了变化。但是关于神话和心理学的联系，弗洛伊德语焉不详，倒是他的学生荣格（Carl Gustav Jung）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发。荣格在时间上处于弗雷泽和弗莱之间，但由于这位瑞士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层面上把神话和原型结合在一起，因此常被当作神话原型批评的创始人。据荣格考证，“原型”（希腊语“arché”，喻初始、根源；“typos”指形式、模式）一词在古希腊哲人的著述中已经频繁出现，指的是“初始的构架”。近代原型概念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一般指作品中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文学现象（如主题、意象、叙事方式等）。原型的概念首先被弗雷泽所采用，借以解释多种文化里存在的神话传说和宗教典仪，通过对这些仪式的形式进行分析，解读出其中包含的结构规律。

对荣格来说，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神话首先是展示灵魂本质的心理现象”，因为原始人的意识思维尚不发达，靠无意识和神话体验现实。此外，关于神话和原型的叙述不再局限于远古历史，而是和现代人息息相关，其中的连接就是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非主体或超主体性（suprapersonal）的人类心

理体系，主要由遗传产生，这是它和个人无意识的主要区别。另外，荣格竭力维护集体无意识观的“科学性”，认为它绝非是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而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在实际中加以验证，并且为寻找原型提供了一些方法。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对弗莱的影响最大，但是弗莱并不喜欢别人叫他“荣格派批评家”，因为他坚持自己是文学家，把研究的对象严格地限定在文学领域，尤其是注重文学文本的细读，注重文学文本间的相互借用、喻指、变形，即当下所谓的“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就说，阅读《批评的剖析》可以使我们“抓住文学艺术独特的多义性，承接文学艺术永恒的挑战”。

尽管原型批评在文学分析中作用很大，但荣格本人很少把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应用于实际文本分析中，原因可能如荣格所言：他本人对文学知之不多；而弗洛伊德虽然也一再说明自己对文学艺术是门外汉，但他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实例大多来自于文艺作品，尽管其“专业性”一直受到医学界和文学界的质疑。荣格或许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教训，特意说明心理学和文学的学科差异，因此不可以把文学作品当作精神病例（尽管从心理学的职业角度讲两者并没有很大差别），文学分析不同于精神治疗，心理学至多只能对文学创作过程进行阐释，对诸如文学深层的形式问题、审美问题则不应说三道四。但是，荣格仍然强调心理学和文学的相通之处：文学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源自心理动机，文学是人际间的科学，文学形象归根到底是神话形象，是人类共有的最原始的遗产。尽管如此，荣格仍然停留在文学的外围，神话原型批评提出的“整个文学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要等到50年代加拿大文学家弗莱的出现才开始。

20世纪50年代弗莱把弗雷泽所说的“原型”从文化和文学角度作进一步深入阐释，发展出一套更加系统完整的原型理论。对早期弗莱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中包括大量使用“自然”意象的当代英国诗人艾略特和在戏剧中大量使用季节和时间意象的莎士比亚，使弗莱意识到在他们的背后也许隐藏有一个西方传奇和仪式的传统。弗莱的主要文学思考集中在1957年出版的《批评的剖析》，但40年代时他曾把有关内容写进《威严的对称》一书；其理论形成还可继续上溯到30年代：他读大学时就对弗雷泽很感兴趣，交的几篇作业谈论原始宗教和浪漫主义，涉及到有关生殖仪式和季节神话。

弗莱和弗雷泽、弗洛伊德、荣格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讨论文化时紧紧

地贴住文学，而不像后者那样集中于人类学或心理学。弗莱的理由是文学涉及的是人类集体，而不是自我个体（排除弗洛伊德），而纯粹神话或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排除荣格）。实际上弗莱和本世纪初的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做法一样，试图给予文学批评以独立的地位，不愿意它和其他学科搅在一起而面目难辨，甚至沦为工具而丧失自己的独特性。弗莱认为，文学批评不等于文学创作，因为后者主观随意性太大，尚无公认的规律可循；而文学批评则言文学所不能言，是文学规律的表现，是有关文学的科学。

弗莱对当时文学批评的现状颇有微辞。评论家多认为他不满意新批评的文学细读法，而主张到文本之外去寻求文学的普遍规律：“我们越往后退，就越会意识到作品的整体构架……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不得不‘拉开’与作品的距离，才能观察到它的原型结构。”但是当时（50年代中后期）新批评已经式微，而且使新批评致命的远不止神话原型批评一家。其实弗莱对新批评的许多观点颇为赞同（如坚持文学性，反对所谓的“外部研究”等），他批评的是当时所有的批评理论，理由是：1、这些批评理论都没有独立的地位（他称之为“寄生性”，如依附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2、它们都缺乏一套宏观的观念框架；3、它们都没有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支持。因此弗莱提出：文学批评的客体必须是文学艺术，文学批评理论要有界定清晰的研究对象；文学批评必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一套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和其他学科一样，文学研究必须要讲究科学性，而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是文学性加理论性。弗莱认为当时的文学批评类似普及性讲座，依赖感官印象，侈谈价值高低，使批评流于肤浅。他倡导逻辑性强的深层次客观分析，主张研究的观念框架须有普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种精英理论；但确实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弗莱在理论实践中依靠一套文学研究方法论，即“归纳法”。其理由是：自然科学研究遵循的也是归纳法，而“演绎法”只适用于发散式的感官印象式批评。更重要的是，弗莱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是“原型”，而原型的获得靠的就是归纳。弗莱推崇的原型是

一种典型的再现意象，连接诗与诗的象征，使我们的文学体验得以完整。

由于原型是一种交际象征，所以原型批评主要把文学当作一个社会事实，

一种交际类型。通过研究规则和体裁，它力图使单首诗歌融入诗的整体。

显而易见，弗莱的原型已经不同于弗雷泽或荣格意义上的原型：它不再

取决于民俗和宗教，不再是遗传给予的无意识内容（尽管弗莱没有完全否认这些），而是文学的普遍存在状态，是种接近于意识的浅层次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弗莱认为文学和神话相通，其最基本相似之处就是结构原则的一致，即“循环性”，因为双方本质上表现的都是自然的循环。但是文学中并没有与神话相对的术语，所以和神话不同，文学的循环性是隐在的，弗莱的任务就是揭示文学对应于神话的内在结构，使文学批评具有方法论原则和自然科学的连贯性，这些观点也是新批评和文学心理分析学派所倡导的，也是其后的批评流派所认同的。在弗莱看来，连贯性体现在文学原型的复现，他竭力要创建的原则就是他心目中的文学图式结构。

这个结构在《批评的剖析》中得到详细的描述。对应于主人公的行动能力，作品可以具有五种基本模式：神话、传奇、高级模仿、低级模仿、讽刺（第一篇，“历史批评：模式理论”）；象征意义可以有五个层次：字面、形容、形式、神话、圣经（第二篇，“伦理批评：象征理论”）；原型结构可以存在四种基本叙述程式（mythoi）：传奇、喜剧、悲剧、反讽或嘲弄，分别对应于自然界四季的春夏秋冬（第三篇，“原型批评：神话理论”）；文学样式在形式和节律上可以有四类：戏剧、史诗、叙事、诗歌（第四篇，“修辞批评：文类理论”）。以上的各个模式/程式/层次/样式，又可以进一步分解出各自对应的一套变化规律。如四种基本叙述程式里包含五种意象世界：启示世界、魔幻世界、天真类比世界、自然与理性类比世界、经验类比世界；启示世界又包含五类原型意象：神明、人类、动物、植物、矿物。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弗莱以上的总体批评模式并不一定能够解释所有的文学创作，也不一定涵盖人们主要的文学体验¹，但毋庸置疑弗莱精心建构的这套体系给几千年的西方文学勾勒出一条新的、清晰的发展脉络，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多有益处。

弗莱的声誉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之后弗莱受到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而迅速淡出批评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弗莱刻意避免价值判断，不免显露出太多的形式主义倾向。伊格尔顿批评他固守文学自足，切断文学批评与外界的联系，“比新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有人批评他的体系过于庞大，虽然挥洒自如，但是大多蜻

1 如非洲人没有类似的四季变化概念，很难体会“落叶悲秋”和“死而复生”等概念，尽管从根本上说弗莱谈的不是外界的自然，而是人类想象对自然的投射。参见刘雪岚，朱刚：《诺思洛普·弗莱的文化遗产——访加拿大“弗莱研究中心”》，《外国文学动态》1999/2。

蜻蜓点水，没有深入的论证。美国学者受新批评影响较深，注重文本“细读”，所以不论是“保守”的传统批评还是后来“激进”的解构主义，都指责他忽视文学语言，对修辞重视不够。近20年更是如此，弗莱的确是生不逢时，怎么就忘记了性别、生态和族裔？在一定意义上，弗莱是50年代保守政治的产物，自然难以应对60年代开始的革命时代。

有意思的是，政治风水轮流转，80年代情况有了新的变化，里根—撒切尔—老布什当政以后，英美社会全面向右转，90年代已经是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文学批评是时代政治的反映，反女性、反黑人、反多元文化的思潮在媒体和学术界早已出现。这股思潮来势凶猛，力图拆除后结构主义“政治正确的庙堂”，消除多元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族裔研究等“十字军运动”造成的“邪恶”影响，把被“传媒大学”（mediaversity）搞乱的文学传统恢复成昔日的文学圣殿（university）。说这番话的是当年解构主义美国学派的代表、耶鲁四人帮之一哈罗德·布鲁姆²，而他正是为这一版《批评的剖析》撰写“前言”的执笔者。在二流文学批评泛滥、批评“天才”难觅的今天，布鲁姆感叹道：“所有这一切都会过去（自然需要一些时日），批评将回到对文学天才的研究……在2000年这个批评的荒蛮时代，《批评的剖析》还不会起到多大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谁还能起什么作用？”在气愤之余，布鲁姆想到的还是弗莱：“文学批评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离开大学，在那里‘文化研究’这个野兽小人得志，一时还赶不走³。学术界的剖析窥探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妇女内衣中秘藏的小秘密，或者是关于女人胸部的叙事历史。批评性阅读是一门学问，教人如何阅读，为何阅读，其闪烁的孤灯爱默生谈起过，华莱士·斯蒂文斯称颂过；那些生活在大学之外的社会中、闭门修读的学者，才能领授这门学问，弗莱的著作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教训和实例，使他们在孤寂中获得慰藉。”

布鲁姆的“前言”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弗莱进行了解读。其实弗莱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大学的殿堂。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度使

2 哈罗德·布鲁姆：“中文版绪言”，《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第1-3页。

3 事实是文化研究已经被逐出了校园：文化研究的标志性组织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2002年被校方强行关闭，14位教师需要自己联系到别的系科“另谋高就”，保留下来的岗位只有3.5个。就学科声望来说，CCCS的社会学研究方向一直在英国名列前茅，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两个本科方向的录取比例最低也有1:10，但是却被校方以学科“优化组合”的名义予以“重组”，并且此举得到了学校教师工会的认可。

弗莱退到后台，但他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批评的剖析》）早已成为西方批评的“正典”。而且和加拿大与美国相比，弗莱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影响有个时间差，虽然他在欧美曾遭冷落，在欧美之外他一直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所以尽管今日学术出版物到了布鲁姆所称的“马尔萨斯似的数量暴涨”的地步，需要进行一番“诺亚方舟”式的涤荡与清理，以留下真正的学术精品，50年的时间表明，《批评的剖析》就是这样的一部精品。

朱刚

HELENÆ UXORI

Foreword

NORTHROP FRYE IN RETROSPECT

The publication of Northrop Frye's *Notebooks* troubled some of his old admirers, myself included. One unfortunate passage gave us Frye's affirmation that he alone, of all modern critics, possessed genius. I think of Kenneth Burke and of William Empson; were they less gifted than Frye? Or were George Wilson Knight or Ernst Robert Curtius less original and creative than the Canadian master? And yet I share Frye's sympathy for what our current "cultural" polemicists dismiss as the "romantic ideology of genius." In that supposed ideology, there is a transcendental realm, but we are alienated from it. The genius is a person at least more open to that transcendence than most of us are.

Historicists assert that genius is only an eighteenth-century idea, in which the saint and the hero were replaced, as they were by Goethe, widely renowned as "the genius of happiness and astonishment." There had been at least three earlier meanings of genius: one's attendant spirit or natural endowment or aspiration. Frye's declaration of genius prompts me to an impish archaism: was this Magus of the North attended by a spirit? It seems likelier that Frye, a formidable ironist, would refer to his aspiration, more even than to his natural endowment.

I fell in love with Frye's *Fearful Symmetry*, his study of William Blake,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1947, my freshman year at Cornell. I purchased the book and read it to pieces, until it was a part of me. A decade later, when *Anatomy of Criticism* was published, I became one of its first reviewers. I am not so fond of the *Anatomy* now, as I was more than forty years ago, but I probably absorbed it in ways I no longer can apprehend. In later years, whenever I lectured at Toronto, Frye would introduce me with considerable polemical fervor, making clear that his Methodist Platonism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my Jewish Gnosticism. I place this upon record, since I have come to praise Frye in this foreword, though with a certain ambivalence. Frye disliked the idea of an anxiety of influence, and told me that whether a later writer experienced such an affect was due entirely to temperament and circumstances. When I replied that influence anxiety was not an affect in a person, but the relation of one literary work to another, and so the result, rather than the cause, of a strong misreading, my heroic precursor stopped listening. He had

FOREWORD

formulated a Myth of Concern, his version of Shelley's notion that imaginative literature was one vast poem with many authors, and so the matter was settled. Borges, going beyond Shelley, suggested that all authors were one author anyway, named Shakespeare. As extreme literary Idealism, that is extravagant enough for me to accept (sometimes) more readily than I can entertain Frye's Myth of Concern.

Frye began as a rebel against the Formalist schools of criticism that dominated Anglo-American academie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the Aristotle-influenced theorists of Chicago, and the more practical New Critics of T. S. Eliot's various persuasions, including his High Church Neo-Christianity. As a young scholar starting to teach at Yale in the mid-fifties, I welcomed Frye as a sage who, unlike most of the Yale faculty in literary study, did not believe that T. S. Eliot was Christ's vicar upon earth. All this is now quaint: Frye and his opponents have been folded together, as antique Modernists inundated by the counter-cultural flood of feminists, queer theorists, sub-Marxists, semioticians, and the ambitious disciples of Foucault, Lacan, Derrida, and other Parisian prophets. Aesthetic and other cognitive values doubtless still exist, but not in the universities, where the new multiculturalists denounce the aesthetic as a colonialist and patriarchal mask. Poetry, demystified, has been leveled.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is taught more frequently than Robert Browning, and Charlotte Armstrong has obscured William Wordsworth. As we turn into the new century, I wonder if I should summon up Frye at a séance, to ask him if he still feels that overt value judgments have no place in criticism? What would he say when told that Margaret Cavendish, Duchess of Newcastle, and Lady Mary Chudleigh have usurped the eminence of John Milton and Andrew Marvell? His high sense of irony doubtless would sustain him, even when informed that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shaped, not by a highly individual imagination, but by the same "social energies" that molded the dramas of George Chapman and Philip Massinger. All this will pass (not soon enough) and the study of genius will return, though doubtless in modes unknown to Frye, or to me. *Anatomy of Criticism*, in this year 2000, is not much of a guide to our current wilderness; yet, what is?

Frye, setting aside the question of his genius, moves me still because his blend of Protestant Dissent and Platonism is securely allied to what remains strongest in our poetic tradition. I am well